



永远的

YONGYUAN DE
CHANGZHENG

长征

刘波◎著

红色近卫军

★
红一方面军长征

★
珍藏
录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未来出版社

来外借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永远的 YONGYUAN DE
CHANGZHENG

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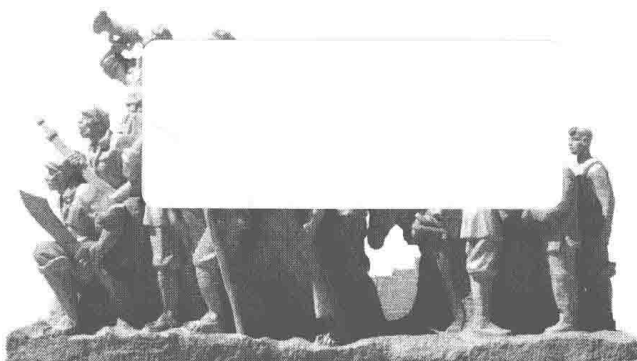


红色近卫军

红一方面军长征珍闻录

刘 波◎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未 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近卫军：红一方面军长征珍闻录 / 刘波著. —西安：
未来出版社，2017.1

(永远的长征)

ISBN 978 - 7 - 5417 - 4978 - 0

I. ①红… II. ①刘… III. ①红一方面军 - 史料
IV. ①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6816 号

红色近卫军：红一方面军长征珍闻录

HONGSE JINWEIJUN; HONGYIFANGMIANJUN
CHANGZHENG ZHENWENLU

丛书策划 尹秉礼 高 安

执行主编 刘 波

责任编辑 高 安 贾文泓

封面设计 许 歌

技术监制 宇小玲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未来出版社
地址：西安市丰庆路 91 号 邮编：71008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安康天宝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3.5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17 - 4978 - 0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秘密进行的长征准备	(1)
第二章	先遣抗日的红军队伍	(19)
第三章	巧妙突破前三道封锁线	(37)
第四章	令人扼腕的湘江之战	(57)
第五章	战略转折的台前幕后	(77)
第六章	四渡赤水绝处逢生	(109)
第七章	为何朱毛没有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135)
第八章	北上、南下风波	(179)
第九章	陕甘支队挺进陕北	(219)
第十章	重建红一方面军	(243)
第十一章	经营陕北根据地	(263)
第十二章	东征抗日	(281)
第十三章	西征打击“二马”	(297)
第十四章	西北抗日大联合	(315)
第十五章	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	(325)
尾声	山城堡战役及新局面	(347)



第一章 秘密进行的长征 准备

长征前的最后一场恶战——中央红军扩红——长征的思想
动员——长征的物资准备——选择长征的突围方向——选择长征
的时机

1934年10月7日，江西瑞金云石山，中革军委驻地，一位来自白区的神秘使者求见周恩来副主席。来人面目狰狞，衣衫褴褛，一副乞丐打扮。很难想象，他便是神秘的中共特科成员项与年。项与年带来的一份绝密情报令周恩来大吃一惊：国民党军即将提前一个月发起对中央苏区的总攻！

原来，在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并在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订了一个旨在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然而，就在庐山军事会议结束的当晚，这份“绝密”的“铁桶计划”就落在了共产党人的手中。

据有关史料记载，这个所谓的“铁桶计划”，是国民党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对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然后在瑞金四周大修碉堡工事，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迫使红军主力在狭小地域内同国民党军决战！同时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调配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期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

当“铁桶计划”被临时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传阅后，他们立即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着极度危险。当时中革军委收到的前方战报显示，

此时整个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雩都、长汀、宁都、会昌五座县城，红军在各个方向均频频告急，明显敌军正在加速合围。“三人团”深感形势严峻，必须要抢在敌“铁桶”尚未完全合拢前，红军主动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天之后，即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由朱德签发的突围出发令，以此为标志，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的长征征途。

项与年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这份绝密情报，对拯救十万中央红军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不过，仅在三天之内，近十万红军想要有条不紊地紧急出动，却殊非易事。其实在此前的近半年时间，长征的准备工作早已紧锣密鼓地开始了，长征的准备始于广昌战役结束后。

长征前的最后一场恶战

广昌战役，红军这一方的实际总指挥是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其中国名字叫李德。李德到中央苏区时，正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时。

历史这时出现了有趣的巧合，当红军有一个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同时，在国民党军中也有一个以德国将军佛采尔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于是，国共双方的军队都在德国顾问的“顾问”下，围绕着对红军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

对中央红军来说，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这已是第五次了。此时，已是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入侵中国的第三个年头。1933年初，日军又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当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围攻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时的中央红军，经过了前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且队伍不断壮大，从游击兵团过渡到了运动战大兵团。一年前，也就是1932年6月，中央红军复称红一方面军^[1]，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刘伯承先后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同年底又进行整编，全军下辖3个军团又4个军，林彪任第一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任第三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任第五军团军团长，共

约7万人。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并兼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兼方面军司令，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兼方面军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方面军参谋长，杨尚昆任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0月，红一方面军组建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萧劲光；组建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

蒋介石以百万大军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用于对付中央红军，塞克特为国民党军制定了“铁壁合围”的新战术：“战术上要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进行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匪区。”陈诚则对此形象地比喻为“抽干鱼塘的水来抓鱼塘里的鱼”。

强敌压境，如何打败国民党军新一轮的“围剿”？李德要求红军以阵地战、堡垒战，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而且经常要求红军对以堡垒作依托的敌人发动进攻。这种打法与中央红军此前四次反“围剿”成功的打法背道而驰，但李德固执己见，认为毛泽东等人坚持的游击战、运动战是“右”倾，说“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李德，住在瑞金郊外一所水田环抱的三居室“独立房子”中，他孤傲的性格，就如同这所不合群的住所一样。他性格固执，听不进中国红军将领的合理意见。时任中共总负责人的博古，年仅27岁，由于他自己不懂军事，便把军事指挥权拱手交给了本只是“军事顾问”的李德。李德，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在战斗中被沙俄的军队俘虏。1919年4月，他在慕尼黑参加过德共的街垒战。因参加革命他曾两次被捕入狱。后来，他逃出监狱参加了苏联红军，不久晋升为骑兵师参谋长，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军事训练。1932年春，他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同年9月，他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成为中央红军的主要指挥者。李德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无疑算得上苏联红军的正规战的专家，尤其对建设一支骑兵有独到的见解，但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情和中国的国情却并不清楚。所以，李德把持下的中革军委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误以为中央苏区已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已经正规化，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便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作战、大军与大军之间的较量。

红军过去打胜仗，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发扬军事民主，集智对敌。俗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然而糟糕的是，李德只听从坐镇上海的共产国际

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指挥。弗雷德全名为曼弗雷德·施特恩，奥地利人。弗雷德在上海的中央局遥控指挥，对红军的实际情况更缺乏了解。满脑子主观的臆断和空想，经常提出一些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军事计划，就连李德对此也抱怨道：“弗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他深信苏联会给予武器援助，并且抱有进行一场大规模正规战争的幻想。”

李德几乎是傲慢地拒绝了所有中国同事的协助，仅凭借一己之力，单独对抗训练有素的整个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集体智慧。而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则云集了一批才华出众、经验老道的德国国防军精英，如：乔治·佛采尔中将、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等军事专家。主要与李德对垒的佛采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陆军作战处长，多次率部突破协约国防线，屡立战功。大战结束后，塞克特任德国陆军总司令，佛采尔被提升为总司令部部队室主任（相当于总参谋长）。仅从顾问团的力量对比上看，便显得极不对称，其作战后果便不难想象了。

第五次反“围剿”最激烈的战事发生在广昌。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对广昌发起总攻。广昌已处于国民党军东、北、西三面包围之下，处境十分险恶。

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九4个军团到江西广昌地区构筑工事，死守中央苏区北大门，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李德下达了《坚守广昌的作战命令》，将防守的红军分为西方集团、东方集团以及广昌支点守备部队，还规定“只有受命后才能撤退”。

27日这一天，是广昌战斗最惨烈的一天。进攻广昌之敌，以一个炮兵旅进行轰击，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边打边建乌龟壳似的堡垒，每次只前进一至两公里，步步为营地推进。在现场指挥红三军团防御的彭德怀描述道：

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

在广昌指挥的李德目睹了一塌糊涂的败绩，不得不同意部队在黄昏后撤出战斗，广昌保卫战遂告结束。

广昌战役，红军伤亡5093人，占参战人员的五分之一，第六师政治部主任曹其灿牺牲。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之后，调集了31个师的兵力于7月上旬向中央苏区中

心发起全面进攻，蒋介石限令8月1日前必须攻占红色首都瑞金。面对敌人的疯狂攻势，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致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本应先避敌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2]但中革军委领导人博古、李德在请示共产国际后，仍继续采取单纯防御战略，已经连续苦战了10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

部队转移到贯桥、高虎埡一线继续进行防御。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依托山地拼死阻击敌军。在彭德怀指挥下，红军构筑了坚固阵地，指战员英勇顽强地实施了反攻击，予敌以很大的杀伤，从阻止敌军进攻进程的角度看，算得上胜利，但红军损失也很惊人。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342人。驿前保卫战，红军将士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十五师就有2352名官兵伤亡。

李德指挥红军死打硬拼的打法，激起了红军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当李德提出，要彭德怀写一篇关于万年亭之战胜利的文章，以证明李德鼓吹的“短促突击”的战术高明之时，彭德怀忍无可忍地断然拒绝，并当面怒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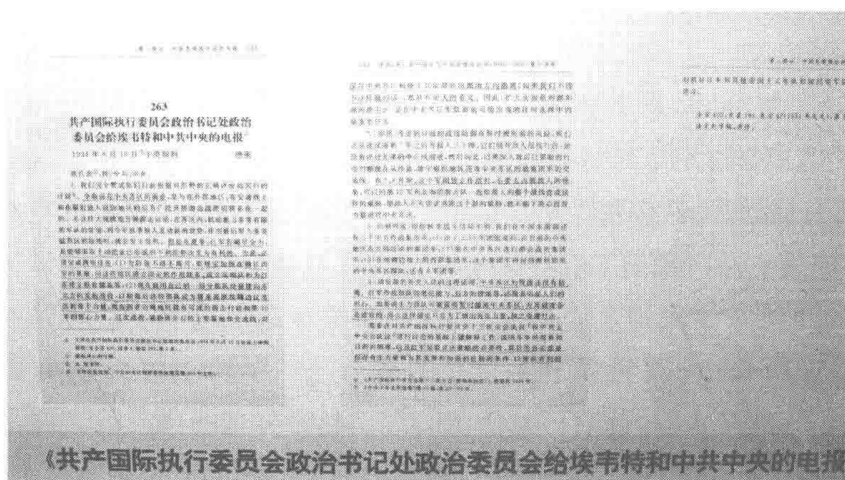
《红色中华》关于广昌失守的报道

彭德怀毫不掩饰自己对所谓“短促突击”战术的反对，他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李德瞎指挥，“怎样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他越说越激动：“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3]

广昌失利，导致中央苏区门户洞开，红色首都瑞金乃至整个中央苏区，在敌人的优势兵力的进逼下，已是岌岌可危。面对这样的险境，中革军委“三人团”开始秘密筹划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写道：“突围的准备从一九三四年五月开始。”“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一九三四年五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4]

博古把准备战略转移的打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了汇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回电询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能让主力继续在苏区内作战？这次电报之后，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然而，不幸中之大幸的是，这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而言，反而无形中却成了一件好事，由于没有了共产国际的干预，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行事。



共产国际关于红军长征的电报

长征的准备从工作，在以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指导下，秘密地开展起来。从军事上的战略佯动和转移目标上，从暗示性的思想动员上，从兵员的补充、训练，从粮食、经费、被装的大力保障，到战略突围方向、突围时机的选择上，都积极、广泛地开展起来。

中央红军扩红

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发出指示，要求5月份开展一次扩红突击运动，完成1.4万名的扩红计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发表的五一劳动宣言中，号召苏区的每一个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加入到红军中去。

5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的《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宣言中，提出5、6、7三个月中央苏区扩大红军5万，5月完成扩红2.7万人的计划。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等又发出了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完成的人数指标为：江西1.1万，直属四县7000，赣南7000，福建2300，会昌1700，宁化1000。并且在动员中要求保障每个新战士有一支梭镖带赴前方，争取每个新战士有一床被毯，草鞋等用具亦要准备充分。在大规模的扩红努力下，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人数达8.6万人，其中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战士。

8月26日，中革军委下令成立教导师，由三个团、一个机枪连、一个警卫连编成之，以张经武同志为师长；9月21日，中革军委组建了红八军团，由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合编而成，由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军团政委。另外，还成立了红三十四师、少共国际师等新的部队。

长征前的思想动员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对即将进行的战略转移，隐晦地作了先期发动。1934年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红星》报发表的《红军抗日先遣队已过闽江》的报道中说：“我们工农红军今年‘八一’全体誓师，在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胜利决心下，准备全体北上抗日。”8月4日，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在部队中解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指示》，8月10日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70期发表的《使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的社论，也都谈到了同样的问题。

当时，有许多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在看了这些讲话或报道后，就预感到中央红军要退出中央苏区。如董必武在看了张闻天的文章后就“因而猜测红军可能要转移了”。9月29日，张闻天又在《红色中华》第239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提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一社论，实际上是向苏区军民发出了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长征的思想动员,考虑到保密的需要,没有明说。李德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5]为了保密,多半只是中央的机关和干部作了出发的准备,而几乎所有的地方机关和地方干部都留在了苏区。留下的干部由项英领导,在军事上由陈毅领导。

由于过度的保密,使许多高级干部都被蒙在鼓里,包括许多中央委员也不知道内情,以至于自己都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部属的思想工作自然也就无法做到位。彭德怀就曾批评说:“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都没有讨论过。”^[6]时任中央组织局局长的李维汉对此也曾批评道:“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7]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使得长征开始后,在突破三道封锁线的过程中,尽管战斗不多,却出现了大批战士开小差离开红军队伍的非战斗减员现象。陈云就指出,其原因第一条就是“政治动员不够”。^[8]

为了进行战略转移,在作战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转变。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红三军团在作战中,要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在战斗的间隙,除三分之一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的政治团结。此时一改过去让部队打阵地战的提法,要求部队进行运动防御,并强调在防御的同时,“应准备全部撤退”。中革军委在9月25日给各军团的电报中再度强调,“一方面你们应给敌人相当的损失和抵抗;另一方面应很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并且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特别要求各军团注意“在飞机轰炸、炮兵集中所威胁不利的条件下,及我们工事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应适时放弃先头阵地(原文如此,应为“地”),以便于我们阵地的纵深内实行突击。应特别注意在战时中不间断的对于部队指挥,在失利时,应有有组织地退出战斗的计划。”^[9]

长征的物资准备

长征前,中央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筹粮筹款运动。1934年6月2日,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了《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7月5日，《红色中华》第210期发表题为《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是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的社论；7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9月30日，粮食部长陈潭秋宣布秋收借谷任务圆满完成。这使得凡参加长征的干部战士都领到了一份长途行军的粮食。

与此同时，根据地的筹款工作也在加紧进行。1934年春天，中共中央下令把埋藏在瑞金附近山洞里的金银财宝统统挖出来，以备长征开始时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红军战士，以便部队离开苏区后，能用通用的银钱购买粮食和军需用品。同时，中央机关各部门还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1934年8月，《红色中华》第227期报道了各地发动群众查找地主埋的金银窖以筹集现款的情况。

在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上，也作了长期的准备。为准备足够的长征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中共中央采取措施，发动群众，加紧生产制造武器弹药。1934年7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做出决定，在苏区开展征集军用品的突击运动。中革军委还在雩都设立了总兵站和物资供应总站，红军制衣厂数千人加紧生产，制作了一大批新的军衣。长征开始时，中革军委将140多万发子弹、7.6万多枚手榴弹和大批物资补充到红军各主力军团，保证了每个指战员都带着一件冬衣，一两枚手榴弹，一支步枪或一把刺刀，以及10—40发步枪子弹^[10]。

选择长征的突围方向

长征出发的突破口选择在哪里呢？

据红军的侦察结果表明，敌人防御相对薄弱的地方在湘粤桂三省交界处。虽然这里也有四道南北方向的堡垒封锁区，但在最重要的东西方向上却没有堡垒相联结。

从这里突围的另一好处是可以利用桂系、粤系与蒋介石的矛盾，他们不会过多地为蒋介石火中取栗，因为他们深知同红军作战就意味着减少与蒋介石对抗的本钱。这里是南路军粤军防御的范围，尽管蒋介石给了陈济棠巨额“剿共”经费，但粤军在进攻中央苏区上一直不太积极，9月，陈济棠还主动派人与红军接洽谈判事宜，这为后来的红军长征借道粤军防线突围，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时任江西“剿匪”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系广东地方实力派，曾三次通电反蒋，现虽驻守在江西省会昌县筠门岭地区，却希望偏安广东地盘，安稳地当其

“南天王”。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11]失败后,蒋介石派其嫡系李玉堂等部,陈兵福建西南地区,威逼广东,令陈济棠深为忌惮。陈作为雄霸一方的军阀,对蒋介石消除异己的企图怀有戒心,担心蒋利用粤军与红军互斗,自己坐收渔人之利,顺势打入广东抄了粤军老巢。为保存实力,陈济棠采取了同红军“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主动派人与红军谈判秘密合作事项。9月,陈济棠派出代表赴瑞金,求见红军总司令朱德,表示愿与红军合作的意向。周恩来、朱德热情接待了来人,讨论了停战和联合抗日等问题。朱德还致信陈济棠,提出“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重申了1933年1月毛泽东、朱德签发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表明了与粤军合作的诚意。信中,朱德向陈济棠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江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卖国贼及法西斯之政治运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12]

在朱德、周恩来的直接推动下,陈济棠不久即致电红军,建议派军事代表来广州面商军事问题。中共中央遂决定派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和粤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为代表,前往粤军独立第一师第二旅旅部驻地江西寻邬县罗塘镇,与陈济棠的会谈代表——少将参谋长杨幼敏及他的两个师长黄质文、黄旭南^[13],举行秘密会谈。

毛泽东对此举深表赞同,此前他就曾对何长工说:“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14]

朱德于10月5日专门为潘、何两人特地写了封信,其内容为: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即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

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

专此顺致戎祺！

朱德手启

10月6日，潘汉年和何长工携带朱德的亲笔信出发，临行前，周恩来叮嘱他们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要以1934年7月《向白军士兵提出六条抗日救国的行动纲领》以及1933年的“三条件”为依据谈判。时任军委副参谋长的叶剑英也关切地说：“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15]

到了红军与粤军的交界处，粤军派出一个连前来迎候，还为他二人专门准备了4个人抬的大轿子。每遇岗哨盘问，连长就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将其喝退，潘、何两人因此畅通无阻地安抵会谈地点罗塘镇。潘、何两人住在镇上的一栋小洋房的二楼，黄质文、黄旭南、杨幼敏住在楼下。

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为后来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多年以后，何长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觉历历在目：

1934年九十月间，忽接周恩来的通知，要我急去瑞金有事相商。于是我迎着朝霞，策马扬鞭、急驰在绵水河畔的崎岖道路上。抵目的地后，周恩来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南天王”陈济棠电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朱德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和潘汉年（公开职务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立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

周恩来亲切而又郑重地对我说：长工，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他还向我交代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

我们经过连来带去三天三夜的谈判，很快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 三、解除封锁；
-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

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本。这是继1933年10月我们同蔡廷锴第十九路军谈判达成停战同盟协定之后,又签订的一个停战协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胜利。^[16]

正当谈判顺利进行之时,周恩来向潘汉年、何长工发来了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暗示他们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开始了,要他们尽快返回。粤方谈判代表对此敏感地问:“你们是否要远走高飞了?”潘汉年解释道:“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的确,与陈济棠的谈判,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成功地找到了战略转移的突破口,其后,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就是以南线作为突破口的。

陈济棠也基本履行了秘密协议。停战协定签订后,陈济棠即派人给红军送来了大量食盐和几百箱子弹。

陈济棠很快就将与红军达成的秘密停战协议的内容要点传达到前线少将以上军官,要求各部队认真履行协议,给红军让出大路通过。同时,为了哄骗蒋介石,陈济棠又令各部广筑工事,派兵扼守咽喉要道,摆出要与红军决战的架势。

突围的人事安排也在悄然进行中。据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回忆:

1934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传达后我又回到瑞金。^[17]

由于李德等人一味地强调保密,所以这些准备工作只是在很少范围内秘密进行,以致在长征前,连许多党和红军中的高级干部,都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广大指战员更是毫无思想准备。正如李维汉所说: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我。据我所知,长征